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 相关文献

冻结中的 J. L.

J. L. en gel

让 · 阿卢什（Jean Allouch）著

中文阅读版 · 更新于2026年10月6日

版本说明

本文依据用户提供的《1991 J.L. en gel.pdf》整理法文原文并译为中文。本版从2026年10月6日的当前权威 Markdown 重新排版，包含最新的“通过 / 渡者”用语与新增译注。

本版保留86个正文、标题与公式分段、65条作者原注及8条译注。原注与译注保留在对应段落后，正文强调和引用链接一并保存；目录可点击，稳定段落标识保留为内部跳转锚点。

底本共17页，页脚署年为“1991 ?”。三组公式按所给 PDF 保留，其中的未划杠 S 不据其他版本擅自改写。文中历史叙述、作者评价与引文依底本译出；译注中的出处与限定按当前源文件保留。

本次导出仅作排版，未改写译文。中文译文及译注以项目权威 Markdown 为准；全文覆盖不等于已经完成独立同行审校。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原始法文及第三方材料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该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

公开阅读与下载：kotoba-rin.com/lacan-other/

目录

题辞与开篇.....4

我的熟稔，你的家族性.....8

诉诸承产女式传承.....15

正常途径的失败.....18

一个谦逊的女婿.....22

一个将获交付家产（kléros）的外孙.....26

结论.....32

现在，玩笑和胡言乱语已经够了，
伪君子的装腔作势也已经够了，但尤其已经够了的，是——
究竟是什么，天杀的?
这里，我缺少一个词；在我的生命中，
每当我想指控某种东西时，我总是缺少这个词[注1]。

——阿尔托

[注1] 安托南 · 阿尔托，《老鸽舍剧院的演讲》（La conférence au Vieux-Colombier），载《L’infini》第34期，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1年夏，第3页。

单是我的在场——至少我敢于这样相信——单是我在我的话语中的在场，单是我的在场，就是我的愚蠢[注2]。

——拉康

[注2] 雅克 · 拉康，《再来一次》（Encore），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年，第17页。

这篇报告所采用的仿个人化形式（就像人们说仿皮革那样）[注]，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当时，我先是公开表态，支持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E.F.P.），随后又受到拉康[注3]的邀请，参与筹建弗洛伊德事业学派（E.C.F.）。我于是写信给拉康，拒绝了他的提议：成为正在组建的某个所谓“通过卡特尔”（cartels de la passe）的成员（我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召请，想必尤其因为我曾被任命为 E.F.P. 的“学派分析家”（A.E.）；确实，有一天，我曾猝不及防地——就像分析中有时会发生的那样——认真对待了《1967年10月9日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

议》[注4]；对我而言，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提出申请，成为候选人）。

> [注3] 让我们说明这个“由拉康”的根据；有些人肯定不会放过对它的质疑。当然，这是一封出自他手的信，哪怕那是一个老先生颤抖的手。但是，说它是他的信，意味着还要采取两项并非所有学生都接受的立场：1 / 拒绝讨论是什么引导了这只手，不论是某种动机还是某个人，在这里对我都无关紧要；2 / 同样明确地拒绝以这样的虚假借口贬损这封信：拉康写信时已不再神志健全。第一个拒绝考虑到，寄出这封信所构成的事件，超越了对其动机的分析，也超越了对其书写方式的分析；第二个拒绝则意味着，在这件事中排除精神医学专家的介入。两者交汇于这一确认：在我眼里，拉康与任何处于相似情势的人一样，仍然是一个主体。

> [注4] 雅克 · 拉康，《1967年10月9日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议》，《Scilicet》第1期，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年，第14—30页。

> [注] “仿”对应法文构词成分 simili-，表示仿制、具有某物的外观而并非该物本身；simili-cuir 即“仿皮革”。作者仿照这一说法造出 simili-personnel，带着戏谑意味，把报告的写法称为“仿个人化”：虽以自己的经历开场，却不宜仅当作私人回忆或个人恩怨来读。结合下文，他借拒绝拉康任命的往事，引出通过、分析家的任命方式与研讨班转录之间的问题。因此，这个“仿”针对叙述形式，并不表示所叙经历是编造的。词义参见 Larousse 法语词典“simili”条；此处用意依据本段及后续论述理解。

我向拉康说出的这个“不”，与我在通过中的投入是一致的；我当时就知道这一点。那种投入，是选择支持一种具有自身特性的精神分析家任命方式；它与那天突然落到我头上的任命方式截然不同[注5]。后者的形式十分传统，因为，不妨这样说，它出于君主的独断。我没有理由接受它：在我看来，它恰恰属于这样一种运作方式——我以申请参加通过的方式与之拉开了距离，从而已经在行动中、至少就我本人而言，不声不响地拒绝了它。而在我追随拉康的这一点上，拉康也追随

了我；我被任命为 A.E.——这显然是公开的——以及其他一些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注6]。

> [注5] 这种差异就写在《1967年10月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议》文本本身中；该文本区分了 AE 与 AME。

> [注6] 在我的回信中，除了这两种任命的差异，我还向拉康谈到我们这个小圈子中闹得沸沸扬扬的纷争。事实上，在我看来，他的信不仅对我而言不合时宜、颇为不幸，而且更是其位置发生滑移的症状；我指的是提出提议者的位置，我在申请参加通过时认可的正是这一位置。“他们闹不和？那么，就说：‘让他们自己去摆平吧。’”写下这些话时，我完全不知道，同一类的一个说法早已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上留下了痕迹。那是弗洛伊德给秘书奥托·兰克的一项建议；兰克当时正遭受柏林同事们的算计，而且最后也确实据此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弗洛伊德对兰克谈到一位萨克森国王，别人请他裁断争执时，他据说回答：“你们那些肮脏的事，就自己解决吧。”（兰克1924年8月10日致费伦齐的信，转引自 E. 詹姆斯·利伯曼，《行动中的意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这当然等于分析的零度。然而，当时作为主体的拉康，不正是处在这一点上吗？换言之，他正因解散 E.F.P. 这一事实本身而遭到了主体性罢黜。E.C.F. 花了十年才承认这个“让他们自己去摆平”的有效性；如今，其成员不再自称拉康所爱的人，这才确实实现了这一点。提前十年，并不特别令我高兴；我很清楚，这一类……提前，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里不妨回想塞梅尔魏斯事件，当然是通过塞利纳——参见《塞利纳手册》第3期，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7年）。

在一个关于转录的研讨会上，引入这样一个直接来自通过经验的特征，我是不是离题了[注7]？这里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恰恰涉及转录与任命之间的联结：无论整体来看，还是逐一来看（速记员的情况除外[注8]），那些先后得到拉康鼓励的研讨班转录——在这些转录中，转

录者的位置至少部分地来自拉康——质量都远远低于那些拉康并未以任命者的身份介入、授予转录者职能的转录。

> [注7] 在我们研讨会的同一个上午，玛耶特·维尔塔尔的报告也会强调这一点。

> [注8] 参见《与速记员的相遇》，载《stécriture 通讯》第3期。在速记员的这份证言中，可以读到：在研讨班的进行中，如果能说谁占据了精神分析家的位置，那只能是她；拉康从不对她讲话，却有一次叫她“打字的女人”。

这一事实还与今天能够观察到的另一事实相一致：E.C.F. 自认是“他所爱之人的学派”（“他”指拉康），但在十年间，它却几乎没有产出值得留下来的拉康研究。当然，这个学派并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团体：人们相信，即使不按文本校勘的方法整理拉康的研讨班，仍然能够研究拉康。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如此。但由于它扎根于一种家族主义，这个学派为我们格外鲜明地展示了一项主要动因；这一动因不当地强化了那种“以为可以省去”的立场。此外，如果注意到事实已经表明[注9]：E.F.P. 的 A.M.E. 特别愿意投入精神分析的这种家族化，我们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通过（一种特定的任命方式）、学派（有别于分析机构，也有别于分析团体）与校勘转录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只要我们要把拉康的教学作为问题来考察，也就是说，按它本来的样子来对待它，校勘转录就是不可绕过的。

> [注9] 1980年3月15日，在 P.L.M. Saint Jacques（！）举行的支持解散 E.F.P. 的会议上，被推到前台的是三位 A.M.E.（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同样支持解散的人中，没有一位 A.E. 来占据这个位置）；他们后来将成为 E.C.F. 的名流。

我的熟稔，你的家族性

凡是投入分析的人，是否都会被要求，把自身属于熟稔之物的东西，记在分析的开路者[注10]本人注入其中的家族“愚蠢”（特殊性）的账上？[注]

> [注10] “Frayeur”（开路者）这个如此贴切的词来自拉康。参见《Les non-dupes errent》研讨班1974年2月12日的一课，拉康在其中把弗洛伊德称为“分析话语的伟大开路者”。另参见随后1974年2月19日的一课。

> [注] frayeur 通常可指“惊恐”，这里依作者原注和 frayage（开辟、开路）的语境译为“开路者”，不译为“恐惧”。标题 familier / familial 分别保留为“熟稔”与“家族性”；idiotie 的“愚蠢 / 特有性”两义由作者括注 particularité 标示。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今天试图编排为一部“精神分析运动史”的那些变迁，似乎表明精神分析与家庭并不怎么相处融洽；两者之间不断显现出某种类似二律背反的东西。

对于这种根本的不相容，对于两条法则之间的竞争——一次主体化的事件可能陷入这种竞争之中——的误认，不正是所谓“野蛮精神分析”格外偏爱的场所吗？之所以如此命名，想必是因为人们终究仍然相信，野蛮人生活在乱伦禁令对他的任何掌控之外[注11]。可是，这个“对他”分明散发着超我的气味！即使这个超我是我们的，是我们投射到他身上的，也不会因此就获得解决这一二律背反的效力；在这里如此，在别处也一样。

> [注11] “……而且，他［拉康］似乎认为，在依塞尔定律被设想为至少大体上与个体发生平行的种系发生中，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标志着从猿到人的过渡，而是标志着一个位于远为高处的过渡：从野蛮人到我们所理解的文明人。”E. 皮雄，《家庭

面对拉康先生»，《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第 XI 卷，第1期，1939年；第二次刊行于《Confrontation》第3期，巴黎，奥比耶出版社，1980年春。

看起来，家庭虽然一度被分析搅得狼狈不堪，却总会经过某种不知名的炼金术，最终恢复元气，然后压倒分析。事实上，我们怎么能不这样理解**弗洛伊德的秘书**这一职能，从奥托·兰克之手交到安娜·弗洛伊德之手的交接[注12]？又怎么能不这样理解另一次交接：我们看到拉康把研讨班的出版和学派的组织交给了自己的女婿？这种双重出现的家族化，实在令人震惊。

[注12] 能够接近弗洛伊德的身体，必须被视为这次传承的一个关键要素。传承尤其通过弗洛伊德与女儿之间的约定而展开：只有她能给予他癌症所需要的护理；仍然依照这一约定，她必须为这一特权付出代价，即把自己对此的任何情感表现都排除掉。同时，弗洛伊德仿佛被吸进了安娜·弗洛伊德的正统主义中；而当他选兰克作秘书时，他还完全可以主张一个异端的位置，支持自己的秘书，对抗“狂热的”学生（参见下文的引文）。例如，他能够赞同同性恋者成为分析学会的成员；或者，就野蛮精神分析家格罗德克的《Der Seelensucher》一书的出版，写信给他说：“我们将请求您允许出版这部异端著作，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尚未变成狂热者的异端。”（转引自 E. 詹姆斯·利伯曼，《行动中的意志：奥托·兰克的生平与著作》，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8页。同一著作第212页介绍了弗洛伊德与兰克对同性恋精神分析家原则上持欢迎态度的立场。）

当然，也可能恰恰在家族的抓钩以为已经把分析牢牢钩住的时刻，分析却隐去了。弗洛伊德开辟的道路，其接续来自它所封闭栖居的家族场所之外——我指的是来自拉康——这一事实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不过，这些家族法则似乎占了上风的例子，并没有穷尽事情的全部。至少还有一个例子，精神分析与家庭的二律背反在那里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解决。要用一个形象立即呈现这一二律背反的另一种形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骇人的形象更有力：梅利塔·施米德贝格在伦敦授课时，脚穿耀眼的红靴子，而那一天恰恰是她母亲去世的日子。因

为，在梅兰妮·克莱因那里，与前面提到的两个例子相反，家庭被非常强硬地要求服从分析的法则。于是，这个形象呈现出一种退出，仿佛与我们已经指出的那种退出相互对称；而且，它与后者一样，向我们标示着这一二律背反[注13]。

> [注13] 菲利斯·格罗斯库尔特，《梅兰妮·克莱因：她的世界与著作》，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98页。

拉康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二律背反作过一些阐明。他对埃莉斯·潘坦那种极其坚决的反对，已经可以被理解为：他向玛格丽特提供了对这一疯狂的接纳——他使自己成为这种疯狂的秘书——而这恰恰是其患者的家庭无论如何都无法提供给她的[注14]。几年以后，在《家庭情结》中，他会与黑格尔一道、用他当时自己的措辞指出：

> [注14] 参见让·阿卢什，《玛格丽特，或拉康的艾梅》，巴黎，EPEL 出版社，1991年。

> “……不为在家庭团体之外得到承认而斗争的个人，在死亡之前永远不会达到人格。[注15]”

> [注15] J. 拉康，《家庭情结》，载《法国百科全书》，巴黎，拉鲁斯出版社，1938年；第二版，巴黎，纳瓦兰出版社，1984年，第35页。

再后来，他还会说——我们总不能不把这听成一种私密的吐露——对一个主体来说，其亲近之人，在多大程度上只能错过他在分析中最终可能主体化为自己基本幻想的东西。而当拉康在1968年说明自己通过《Scilicet》向谁讲话时，他把 bachelor 界定为“尚未结婚的人”[注16]。反过来，在1973年，当他命名并辨认出 SAMCDA 时，他又不忘指出，这一国际组织“长期被缩减为家族性的”[注17]。在我们看来，值得

注意的是，时隔约二十五年，他再次断言家族的掌控、家族的经营具有“缩减性”。1972年5月4日，拉康在圣安娜医院的一次讲座中还说：

> [注16] J. 拉康，《以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期刊之名介绍〈Scilicet〉》，《Scilicet》第1期，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年，第4页。

> [注17] J. 拉康，《电视》，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第27页。

> 这种神经症，人们并非毫无根据地把它归因于父母的作用；只有在父母的作用能够从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上得到联结的整个范围内，它才是可及的。……总之，任何造成创伤的父母，都处于与精神分析家相同的位置。区别在于，精神分析家再生产神经症，而父母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生产它。

然而，即使大量迹象似乎都应联系到精神分析与家庭的这一二律背反[注18]，一旦要明确它的内容，或者更进一步，把这一二律背反写出来，我们仍然十分无助。只有精神分析与家庭之间存在某种同质性，才可能允许我们表述两者的二律背反；那么，这种同质性究竟属于什么层面？

> [注18] 这些迹象从最常见的情形——分析者一旦以为自己可以投入家庭，就中断分析——一直到最有趣的情形——拉康幽默地建议精神分析家不要对婚姻发表意见。

弗洛伊德很快就把自己与其他几个人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看作一个家庭，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回答问题[注19]。在1960年3月23日的研讨班中，拉康就此指出：作为分析之父，弗洛伊德把分析留在了女人与蠢主人手中。他紧接着补充说，至于女人，这些充满许诺的存在，人们还一直在等着这些许诺得到兑现；至于蠢主人，他按照他们属于左派还是

右派，分别把他们称作呆子或无赖，同时又指出：呆子聚成集体便成了无赖行径，而无赖行径聚成集体便成了愚蠢。

> [注19] 《图腾与禁忌》值得被读作弗洛伊德对“戒指”（Ring）这一旗号下的团体中所产生冲突的解释。这项研究提供了这些冲突的一个家族主义版本（尤其是把学生认同为儿子）；有关人士从一开始就广泛接受了这一版本。

俄狄浦斯主义同样不能被当作精神分析与家庭的共同地带，更不用说和解的地带——除非忽视一个事实：在分析中，我们大量面对的力比多投注，并没有落入俄狄浦斯的网中。俄狄浦斯主义既不适合作为家庭与精神分析的接口，也不适合作为两者二律背反的解决办法（不少分析家追随弗洛伊德，承担起亲自分析自己孩子的责任，这一事实也表现了这一点）。

因此，在我们看来，接近这一二律背反的最佳办法，仍然是研究具体个案。

当然，如果列一个名单，先收集安娜·弗洛伊德、嫁给施米德贝格的梅利塔·克莱因、朱迪特·米勒的名字——这里只举最显著者中的三位——这份名单似乎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女儿仿佛被一种职能吸了进去，而男孩反倒会逃避它[注20]。当然，分析家的夫妻家庭也值得提及：这种组合与精神分析和家族后代之间的组合一样奇特，但奇怪的是，它在公开表现上却明显更低调。不过，按恰当的分析方法，我们认为不能笼统地看待精神分析与家庭的这些联系。每个个案都因其独特性而有价值。弗洛伊德分析安娜；安娜没有结婚，却与父亲共用一个候诊室。拉康把朱迪特嫁出去，但据我们所知并未分析她；她也不以精神分析家自我授权，却主持着一个“弗洛伊德领域”的命运。梅利塔先由母亲分析，随后由艾廷贡、霍妮、夏普和格洛弗分析；她成为

精神分析家，却公开、极其激烈地反对母亲，最后移居他处。这些差异如此重要，使我们无法笼统处理这一问题。

> [注20] 弗朗索瓦兹·多尔托的承继，也确实没有否定这一观察。

所以，如果拉康研讨班的转录问题与他所建立的分析家族化的特定方式之间，确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存在事实上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考察这一方式的特殊性，才能研究这种关系。

这里提出的论点如下：拉康把自己教学的传承家族化；依照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法则效力的必然性，这种家族化要求他的研讨班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出版的状态。这意味着，只有从对这种家族化“说不”出发，才可能有像样的——也就是说，经文本校勘的——研讨班出版；除非某种这样的出版，恰好本身就实施了这一说不的行动。再换一种说法：对于以这种方式出版拉康研讨班及其他发言，人们一直维持着一种抑制；只有当人们自我授权，去质疑拉康本人那个把自己教学传承家族化的决定时，这种抑制才可能解除。

现在，距离我提出把这种家族化辨认为**承产女式传承**，已经两年了[注21]。当时，我只向自己所属学派的成员提出这一意见。如今，瑟伊出版社出版了它所提供的版本的《**移情**》研讨班，这迫使我把这一分析公之于世[注22]。因为，必须解开一个仍然牢牢锁住的局面；而且，正如这次最新出版所表明的，挑衅在其中并未缺席。最近出版的这一版本错误严重，严重到失去了任何可信性；偏偏这同一研讨班已经有过一个校勘整理本，任何诚实而有识之士都能承认其工作的严肃性——我们怎么能不从这次出版中看出挑衅呢？事情如此离谱，迫使我们承

认，它一定与一种持续坚持的不出版拉康的意愿有关；这种意愿还有不少其他迹象，而且同样令人遗憾。

> [注21] 让·阿卢什，《I.P.A. 的 O.P.A.》（L'O.P.A. de l'I.P.A.），载《Fragments》，拉康精神分析学派内部通讯，第10期，1989年6月。

> [注22] 1991年3月22日，我向瑟伊出版社负责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由于他本人完全与雅克-阿兰·米勒的官方立场保持一致，我更加明确地被迫把话说清楚。因此，今天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把承产女式传承这一参照详加说明；在那封公开信中，这一参照必须说出，却几乎不可能得到论证。

诉诸承产女式传承

拉康最终决定，把“这一切”[注23]交给女儿朱迪特和女婿雅克-阿兰 · 米勒，这没有人争议。但我们还需要展开考察这一选择，并对它所包含的必然后果作一些评估。

> [注23] 参见下文，“这一切”所出自的那个故事的转述。

“承产女式”（épiclère）传承得名于古希腊，尽管这一制度可能源于印度，而且在其他很多地方也能找到相当的制度，尤其是在以色列文化中[注24]。它虽然属于例外，却仍然受到完善的规制。例外在于：一个男人没有儿子，而唯有儿子才有资格合法继承 家产（kléros），即韦尔南所谓的“家族地产”[注25]；其中尤其包括收藏在 thalamos[注26] 中的 agalmata，那是家宅最隐秘的地方，只有女人可以进入。例外情形有例外的解决办法；但这里的解决办法，旨在经过一个历时一代人的迂回后，把传承带回正常轨道。韦尔南明确指出，这一迂回是一项“义务”[注27]（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分析被承认为准确，就必须承认，对雅克-阿兰 · 米勒的某些批评，只有忽略他所见证的东西才站得住脚；而他所见证的，恰恰是他不过在履行一项义务）。这个男人总之被自己的 家产（kléros） 所困；他的一个女儿，原本作为女儿守护着父亲的家宅、照管炉火，现在将不再离开这个家宅。父亲去世后，她嫁给父系叔伯；若无，则嫁给该叔伯的儿子；若无，则嫁给父系叔祖伯祖；若无，则嫁给该叔祖伯祖的儿子，由此抵御没有儿子作为继承人所造成的灾难。须注意，获选者是作为父亲的替身而被选中的。他接受了一种真正的放弃，因为他的儿子与其说是他的儿子，不如说

是承产女通过他[注28]、给予自己亡父的儿子，为的是让这个儿子继承家族的 家产（kléros）；这样一来，事情便重新归于秩序。[注]

> [注24] 下文将参照让-皮埃尔 · 韦尔南《希腊人的神话与思想》中的研究，第 I、II 卷，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5年；还将参照耶斯佩尔 · 斯文布罗较少为人所知的研究，见其著作《Phrasikleia》，巴黎，发现出版社，1988年。亦可查阅菲斯泰尔 · 德 · 库朗热，《古代城邦》，巴黎，阿歇特书店，1900年，第82页。菲斯泰尔 · 德 · 库朗热的猜想，恰如其书名所指，使我们能够把承产女式传承与原始家族宗教相联系，而不再仅仅把家庭视为持有财产的社会实体。这样，家产（kléros） 的传承便与对 kléos、对“声名”的关切联结起来；斯文布罗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参见上述著作，尤其第18页）。

> [注25] J.-P. 韦尔南，前引书，第 I 卷，第140页。

> [注26] 同上，第152、154页。

> [注27] 同上，第145页。

> [注28]　在希腊，这个女婿被要求每月至少与妻子同寝三次。对他所怀有的期待，已经不能更明确了。

> [注] épiclère 在本文中指父亲无男性继承人时、负有保存父系家产并经下一代传续家系之职的女儿，译为“承产女”；transmission épiclère 译为“承产女式传承”。这一定义依据作者本段及下文的论述，不把作者关于制度起源的推测另作事实确认。kléros 译为“家产”，并在译名后保留原词；agalmata、thalamos 保留原词，分别结合文内“珍贵物”和家宅隐秘空间的说明阅读。

韦尔南指出，这种通过女性（per　　feminas）、而非通过男性（per viros）的传承，相对于后者，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倒置”[注29]。女人在正常途径中是流动的要素，在这里却是固定的，因为她被固定在父亲的家宅中。在正常途径中，她必须放弃守护父亲家宅的职能，才能成为妻子与生育者；相反，在承产女式传承中，必须放弃建立自己家宅的是她的丈夫，而这项放弃是为了她父亲的利益。至于儿子，在正常

途径中，他隶属于自己的父亲；但在承产女制中，他仍与母亲相联系，从而通过母亲，与她的父亲相联系。

> [注29] J.-P. 韦尔南，前引书，第 I 卷，第146页。

就像拉康在界定渡者（passeur）时说，他“就是”通过[注]，韦尔南也毫不退缩地写道：这个承产女，这个身为母亲的女儿，与父亲的家宅“融为一体”[注30]，她“就是”[注31]（斜体为韦尔南所加）这个家宅。她持有父亲的 家产（kléros），却并非它的所有者；除了为了保存它，她不能动用它。这种传承的例外性质，在她这一层面上格外鲜明，因为她被要求不服从女性性的这种划分：一边是守护家宅的女儿，一边是生育的女人。这种划分对于亲属制度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女人只有不再代表一个家宅，才成为生育的女人（她不再代表父亲的家宅，也永远不会代表丈夫的家宅）。承产女承担了赫斯提亚的两个面向：她提供孩子，最好是男孩；同时又是处女之女的形象，parthénos，照管着原生家宅的炉火。赫斯提亚因拒绝屈从于阿佛洛狄忒的诱引，从宙斯那里获得了守护家宅的职能。在这一意义上，她体现了一种没有性关系的 家产（kléros） 传承；韦尔南告诉我们，这种传承仿佛是：

> [注30] 同上。

> [注31] 同上。

> [注] passeur 译为“渡者”，与申请参加通过的“过者”（passant）相区别：过者讲述自己的分析经验，渡者听取并向评审团转述这份证词。通过这项程序可按以下安排来说明：要寻求通过的人，即“过者”（les passants），向此时必须处在分析中的两位证人，即“渡者”（les passeurs），讲述他自己的分析及其分析的结束；继而由这两位证人分别将这份证词转述给一个7人评审团，其中一些成员已成功地亲身经历了通过。然后，评审团基于这两份证词，决定是否准许候选人通过。没有任何预先建立的标准来指导评审团，因为通过所基于的原则在于每个人的分析都是独特的。如果候选人取得成功，便会被授予“学派分析家”（Analyste de l’École，简称

> A.E.）的头衔。未能取得成功的候选人，如果还希望再度寻求通过，也不会遭到阻止。这里所述“7人评审团”及其成员构成的具体出处待补，不应将其视为各学派、各时期一律适用的规则；

“……父系血脉通过女儿无限延续，而为了生育，并不需要一个‘外来的’女人”[注32]。

> [注32] 同上，第132—133页。

韦尔南又补充了这一根本特征：

“这种纯粹父系遗传的梦想，从未停止萦绕于希腊人的想象”[注33]。

> [注33] 同上，第133页。

赫斯提亚的两个面向体现在同一个承产女身上，就实现了一种女人的形象：她是“唯一真正具有生成功能的力量”[注34]（韦尔南语）。因此，这一体现，把一种排除女人的父系传承之梦——在这里，女人只能是外来者——与一种被定位为纯粹女性的生成方式联系起来。这就是性关系的不存在所引出的那些奇异的杂技动作之一。

> [注34] 同上，第148页。

让我们逐项列出拉康对承产女式传承的这一选择。

正常途径的失败

拉康曾设想，正常途径应是由学生承担自己教学的传承。在确认这一失败之前——对他而言，这一确认是十分逐渐地形成的——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他把这一教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后来被称为教学的

东西，视为 家产（kléros），视为家族地产。相反，恰恰是在拉康逐步确认通过学生传承的失败时，它才获得了这一价值。

1980年初，这一失败变得显而易见；在此之前，这一切多少是在低声进行的。通过解散 E.F.P. 的信，拉康当时似乎把自己的教学与那个机构解开了联系；在这个机构中，他的学生聚集在一种并非有意建立、却真实存在的等级秩序中。这样的行动，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拒绝把传承的任务交给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与他的教学风格一致，拉康当时本可以显得正在冒险迈向最大的风险：把自己的教学交给那些在未来某一天——显然是相当遥远的一天——会被证明已经传承了它的人。没有预先指定、谨慎防范，而是把自身置于与这一赌注相称的位置。

只有不知内情的人，才可能这样看待事情。不到一个月后，拉康也许因那些在这场解散中觉得自己在主体层面被撂下不管的人而感到不安，便已提议把某些碎片（那“一千人”）重新黏合，以便——正如 Delenda 很快就会说的——对抗学派的“胶黏”。在弗洛伊德事业的这次重新黏合中，家产（kléros） 以决断的方式覆盖了教学，把它封装进一种至今仍然有效的传承风格中。弗洛伊德事业的撕裂，以及同名学派的出现，只会强化这一问题结构：昔日 E.F.P. 的等级层被彻底排除，而这些人此前仍执意相信自己是家族的一部分。

对学生的这种拒斥，确实早已酝酿。我在这里不打算逐次列举拉康公开痛斥那些仍然忠于他的人，尤其是通过评审团成员的所有场合。与其如此，我更愿意通过一句妙语来说明。有谁会怀疑，他向雅各布森提出、而后者完全没有听懂的问题，也是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呢？人们记得，他问的大意是：

“作为语言学家，您甚至能够设想自己拥有学生吗？”

那已是他的学生群体中出现一种奇怪而前所未有的分裂的时期：一边是临床工作者，另一边是逻辑学家，这种分裂愚蠢到近乎漫画的程度。它引发了一场短暂的交锋，《分析手册》中还留有痕迹。当时，拉康已通过促成后者的介入，来撩拨前者。于是，在一个晚上，在一次于他看来已证实 《Scilicet》 惨败的会议后，学派的一位名流用自己的小汽车送他回家；为了免得那些已占据位置的学生还不明白，拉康对他说：

“我总不能把这一切交给高师学生吧！”

尽管尽可能地坚持了这一策略[注35]，拉康却并不认为它带来了预期结果。从以下两个场景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这两个场景不可能不为公众知悉，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一个由他的女婿讲述：我们看到拉康打开了家中存放研讨班速记稿的柜子——但这是当着格洛丽娅（他的秘书）的面——一边嘟囔着：

[注35] 一直延续到在万塞讷试验大学设立精神分析系，以及设立临床部。

“唉！谁来照管这一切呢？”[注36]

[注36] 雅克-阿兰 · 米勒、弗朗索瓦 · 安塞尔梅，《关于雅克 · 拉康研讨班文本整理的访谈》，《精神分析记事本》第4期，日内瓦，1984年，第15页。后以《关于〈研讨班〉的访谈》（Entretien sur Le Séminaire）为题再版（注意其中的大写字母），巴黎，纳瓦兰出版社，1985年。

有一天，格洛丽娅把这一故事轻声告诉雅克-阿兰 · 米勒；就在她这样做的行动中——这是真正秘书的行动，而非书记员的行动——拉康的

感叹便获得了一种指派的效力。因为，米勒在向我们提供的这个故事的转述中，立刻补充道：

“好吧，我就是那个照管这一切的人。”

另一个场景——因为必须有两个，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创伤一样——确切发生于1972年6月。以下是 E. 鲁迪内斯科向我们报告的情形。一起吃晚饭的细节远非无关紧要；它低调地、却充分地标示了一种熟稔的、很可能也是家族的亲近关系：

> 1972年6月的一次晚餐中，米勒当着拉康的面［所以餐桌上还有其他人；我敢打赌，朱迪特就在其中］，批评其他人所作的各种转录尝试。他断言，这些作者［不要太快略过这个词；它在这里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却注定会在这桩事中大有前途］的方法不对；拉康当即回答：“证明它。”[注37]

[注37] 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百年之战》，第 II 卷，巴黎，瑟伊出版社，1986年，第568页。

尽管这一切早已酝酿，尤其通过女儿朱迪特与雅克-阿兰·米勒的婚姻——这场婚姻将给拉康带来那个他会在一届研讨班中向我们谈及的外孙——在我们看来，最后这个场景才标志了承产女式传承的真正开端，标志着他对这一特定传承方式的投入（后来，除其他事实或公开言说之外，雅克-阿兰·米勒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也将印证这一投入）。

一个谦逊的女婿

在承产女式传承中，这个女婿选择不建立自己的家庭，而以这一重大牺牲为代价，加入岳父的家庭，以便参与其 家产（kléros） 的传承；说他“谦逊”，实在已经是最轻的说法了。把一种谦逊点名出来的，是拉康；在瑟伊出版社首次出版的、由其女婿转录的研讨班的后记中[注38]，他特意向我们谈到“……J. A. M, 的谦逊，……”。拉康甚至进一步，多少缓和了这种谦逊：女婿在说明中署名“J. A. M.”，从这种写法中已无法读出他的姓，而他的名字本身也受到了一些损伤（没有按正字法应有的形式、也没有按他在别处所用的形式写作 J.-A.[注39]）。拉康在后记中作了校正，写作“J. A.”；这两个字母仍然分开，Jacques 与 Alain 之间的连字符……仍然缺失；但他紧接着只写了“M,”，即 M 后面没有句点。逗号之后的内容立刻解释了这一点：“Jacques-Alain，姓 Miller”。名字重新以完整字母写出，同时又通过逗号与姓分离。两页以后，拉康认可了那个谦逊的 J. A. M.，即为说明与研讨班编写署名的形式。

> [注38] 雅克 · 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第251页。署名 J. A. M. 的说明就在前面，即第249页，只不过这一页……没有印页码！

> [注39] 尤其参见：雅克-阿兰 · 米勒，《访谈》，前引书，第9页。

我们从雅克-阿兰 · 米勒本人那里得知，他必须把这种谦逊落实到什么程度：也就是那句著名的“在这里，我们想让自己不算什么”[注40]，它恰好对应着承产女式传承对女婿的要求。对于“不算什么”的那项同样值得注意的说明，进一步使我们看到这项义务的影响：“不算什么，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我能够写下我，而这个我是拉康的

我”[注41]。倘若这句话不从头到尾属于承产女式传承这种受到规制的社会组合，它就纯粹是一句疯话。

[注40]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第251页。

[注41] 雅克-阿兰·米勒，《访谈》，前引书，第23页。

J. A. M. 被卷入承产女制中“不算什么”的要求，因而在编写并出版研讨班时，确实只能像他实际做的那样，拒绝按拉康的提议署名“雅克-阿兰·米勒”[注42]。同一要求也使他的共同作者地位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色彩。如果他不只是“在法律上”[注43]是共同作者，那就只能通过把自己写下的我认同为拉康的我来实现，而不是作为另一个与拉康一起写作的人。因此，按照这一逻辑，在一部尤其有雅克-阿兰·米勒与朱迪特·米勒参与的集体著作中，我们看到下面这条值得好好玩味的记录；但既然这个我已如此被认同，事实上就没有什么禁止它出现：

[注42] 同上，第17页。

[注43] 同上。

拉康，雅克，《论偏执狂精神病与人格的关系，附〈关于偏执狂的早期著述〉》，文本由雅克-阿兰·米勒整理，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年[注44]。

[注44] 《拉康与语言的主体》（Lacan and the Subject of Language），埃莉·拉格兰-沙利文、马克·布拉赫编，纽约与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有确凿的痕迹表明：在作为拉康替身的位置上，J. A. M. 已经承担着一种维护岳父 家产（kléros） 原有存在的关切[注45]。这在岳父尚在世时就已经如此，甚至当拉康本人损及神圣不可侵犯的 家产（kléros）

时，也依然如此。确实，只有 J. A. M. 才能够像他实际做的那样，在1977年3月8日的《无意识的失败即是爱》（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研讨班中介入。下面就是这段小故事：

> [注45] 他称呼岳父的方式，不正标示了他与这个 家产（kléros） 的关系吗？令拉康的分析者们非常惊讶的是，他称岳父为“拉康医生”，甚至“亲爱的医生”。在《电视》中，这个“亲爱的医生”被明确地与排除对如此称呼的人物的任何竞争位置联系起来——一旦辨认出承产女式传承的影响，这的确就是可以预期的。

拉康：一个主体——因为我就是这样指称带横杠的 S 的——一个带着他全部软弱、孱弱的主体，怎样能够占据真理的位置，甚至使之产生结果呢？他以这样的方式置身其中，也就是说…… [在黑板上]

$$\frac{a}{S} \quad \frac{S_2}{S_1}$$

[注]

> [注] 底本第11—12页三组公式均印作未划杠的 S，尽管上文说的是“带横杠的 S”。这里按所给 PDF 保留，未据通行话语公式擅自改写。原页公式裁片见本目录 original/assets/。

[拉康犹豫；坐在听众前排的 J. A. M. 明显表示反对；拉康又来了一次：]

$$\frac{a}{S} \quad \frac{S_1}{S_2}$$

J. A. M.：把 S 放在 S_1 的位置，把 S_1 放在 S_2 的位置，把 S_2 放在 S 的位置。

$$\frac{a}{S_2} \quad \frac{S}{S_1}$$

拉康：你们看，这里面可有的是让人弄糊涂的东西！是的，这样无疑更好，这样无疑更好；但这样也更令人困扰。我的意思是，S_1 与 S_2 之间的裂隙格外显眼，因为这里有某种东西被中断了；总之，S_1 只是知识的开端，可是一种只满足于不断开始的知识，什么也达不到。

拉康的这个“可是”，使他成了自己的异端（女婿提醒他的，正是这个“自己”）；这就是本文的意义，以最为浓缩的方式概括出来。

今天，我们还必须推导出 J. A. M. 这种谦逊的后果；其中尤其包括承认：自1972年6月那次晚餐以来，拉康派运动中不存在——至少已不再存在，如果确实曾有过某种类似的东西——一个“米勒派潮流”[注46]。反倒存在一种传承的家族化：拉康的 家产（kléros） 的传承在拉康家族中“凝结”了（就像人们说酱汁“凝结”那样），这暂时表现为、也必须表现为家族对这个 家产（kléros） 的掌控。只有承产女制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远非把拉康拉向某种不知所云的米勒主义，实际上是米勒家族——拉康女婿的兄弟、女婿兄弟的妻子[注47]，据说还有其他人——追随雅克-阿兰，仿佛被吸收入了拉康家族。

[注46] 参见伊丽莎白 · 鲁迪内斯科，《文学杂志》，1989年4月。

[注47] 后面这两个人物最近在瑟伊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收入“由雅克 · 拉康创立，由 J.-A. 与 J. 米勒重新启动”的丛书（这已经不能说得更清楚了，甚至包括：说到重新启动，那完全是零，正如承产女制的一项根本要求所规定的！）。一种尴尬开始公开说出。J.-A. 米勒：“C.［审查者］——这桩家族故事难道永远不会结束吗！I.［宽容者］——您说得比自己想的还准：他［为什么不是‘他们’？朱迪特到哪里去了，她的名字明明就在上面出现？］开始出版自己兄弟和弟媳的书了……C.——米勒氏族！这一帮人。”在这篇署名雅克-阿兰 · 米勒的宣传文字中，朱迪特

> 所受到的特殊处理、无论如何要为这种持续的家族性提供解释的关切，以及“米勒氏族”这一名称似乎至少同样合乎雅克-阿兰本人和其批评者的意思，这些都表明了与承产女式传承的一种双重关系：它在事实上存在，却又必须被多少遮掩起来——我们从这一特征中读到一种迹象：人们并非全然不知道，从分析的立场看，选择这种承产女式传承……同样不合适。

米勒派潮流的缺席——但说“缺席”已经说得太多了——也可以在学说层面辨认出来。如果按照人们能够谈论一个科耶夫版本的黑格尔的意义来说，那么就不存在一个米勒版本的拉康。从我们对拉康选择承产女式传承的辨认出发来看，例如，在“拉康与哲学家”研讨会[注48]上，没有一位发言者认为自己需要援引一个所谓“米勒式”的版本，这就显得理所当然。同样属于这一承产女制结构的，还有这样的事实：分析雅克-阿兰 · 米勒所提供的《移情》研讨班转录中的大量错误时，我们找不到任何根据，可以断言这些错误受到了某种学说方向的引导。它们东拉西扯、彼此背离——我说的是论点，而非拉康的风格；后者确实经历了一种有规则的变形——问题显然不在这里。

> [注48] 《拉康与哲学家》，集体著作，国际哲学学院文库，阿尔班 · 米歇尔出版社，巴黎，1991年。

一个将获交付家产（kléros）的外孙

在承产女式迂回的整个期间，家族地产都必须保持不被触动；不能在社会中加以经营。因此，只有当 家产（kléros） 被交给有权获得它的人——即承产女给予自己父亲的那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成年、因而成为继承人之后，家产（kléros） 才能重新面对社会生活的变故、市场法则，以及产生盈利或损失的投资活动。与等待外孙成年相联系的这一悬置，与拉康研讨班末期的几项材料相互呼应。

拉康在弗洛伊德之后、却又以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方式，从一个父亲的位置思考传承；他那句著名的“je père-sévère”（我严父 / 我坚持不懈）[注49]，足以证明这一点。可是，这个“严父”恰恰是一个父亲：他感到有必要说出自己坚持不懈（而非仅仅去做），由此表明，他恰恰并不确定自己能够坚持不懈[注50]。[注]

[注49] 雅克 · 拉康，1980年1月5日的信，所谓“解散信”：“……如果我 père-sévère，那是因为已进行的经验……”

[注50] 我在别处指出过，这个严父具有怎样的人格，恰恰就是“自我惩罚者”（héautontimorouménos）的人格。参见让 · 阿卢什，《玛格丽特，或拉康的艾梅》，前引书，第509—510页。

[注] père-sévère 把 père（父亲）与 sévère（严厉）组合起来，与 persévère（坚持不懈）构成同音双关；下句同时谈论“严父”与“坚持”。

另一项材料，是拉康外孙的形象在研讨班中浮现[注51]：拉康当时[注52]向出席者谈到他，是为了向他们指出一种认同。对一个希腊父亲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儿子更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像自己的孙辈[注53]。当拉康告诉我们，他的外孙像他一样，长着“一个大脑袋”[注54]时，他向我们指出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相似特征。

[注51] 今天，若要研究弗洛伊德选择安娜 · 弗洛伊德来传承他所想要的分析，却忽略在他的一个外孙身上重新出现的这条家族旁支，似乎已不可想象。这个外孙是索菲的儿子恩斯特 · 哈尔伯施塔特；他将作为精神分析家在科隆附近定居，但此前已请求安娜允许他改姓，并得到了她的许可。他于是让人称自己为欧内斯特 · W. 弗洛伊德；专长是：面向外国人的、二十小时的加速精神分析治疗（参见德特勒夫 · 贝特尔森，《弗洛伊德家族的日常生活：葆拉 · 菲希特尔的回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

[注52] 早在1971年11月4日拉康在圣安娜医院所作的讲座中，就已经谈到了 petits enfants——但有这样一种歧义：当时也可能说的是年幼的孩子：“……有一个正题：没有性关系。我说的是说话的存在。有一个反题，就是生命的再生产。这是

一个熟知的主题；这是天主教会当前的旗帜，在这一点上，应当向它的勇气致敬。天主教会断言存在一种性关系，就是那种会生出小孩子 / 孙辈（petits enfants）的关系。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坚持的断言；只是它无法被证明。”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仿佛受其当时所展开的主题推动，拉康在这里说的不是 enfants（孩子），而是 petits enfants（小孩子 / 孙辈）。

[注53] “希腊人对后代的兴趣，主要从‘孩子的孩子’开始。”耶斯佩尔 · 斯文布罗，《Phrasikleia》，第76、81页。

[注54] 忒勒马科斯与父亲奥德修斯之间，也有这种类型的共同特征；Télémakhos 确实意为“在远方战斗的人”。参见 J. 斯文布罗，前引书，第78—80页。

我有一个外孙，名叫吕克——这是个古怪的主意，不过是他的父母给他取的名——他叫吕克，他说的东西相当得体。他说，总之，那些他不理解的词，他会努力把它们说出来；于是他推论说，正是这让他的脑袋膨胀，因为他跟我一样——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我的外孙——他跟我一样，长着一个大脑袋。……他这样把无意识界定得那么好，因为我们谈的正是这个，［谈的正是］这种切入，也就是说，词语进入了他的脑袋；他从中推论，正因如此，他才有一个大脑袋。总之，这是一套不怎么聪明的理论，但在这个意义上是切题的：它是有动因的。总有某种东西使他感觉到，说话是寄生性的。于是他又往前推了一点，认为正是因此，他才有一个大脑袋。在这个场合，很难不滑入身体的想象，也就是说，滑入大脑袋的想象。可怕之处在于，这合乎逻辑；而逻辑在这里，可不是一桩小事，也就是说，它是人的寄生物[注55]。

[注55] 雅克 · 拉康，《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1977年3月8日的一课。

拉康不可能更明确地把这个外孙牵涉进自己教学传承的大事中。同样，雅克-阿兰 · 米勒的获选，也尤其基于当时他与拉康共有的一项特

征：关心如何让精神分析接受逻辑的检验[注56]。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把外孙推到首位，对应着拉康与逻辑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极其显著的变化。

> [注56] 雅克-阿兰 · 米勒，《访谈》，前引书，第19页。

此外，怎能不为这一显著的闭合所震动：外孙作为拉康的 家产（kléros） 的潜在持有者出现，把我们带回了研讨班中的一个例外事件——拉康提到了后来将成为他母亲的那个人，而且恰恰是在谈到构成这个 家产（kléros） 的珍贵性质之物，也就是 agalmata 时？而那并不是随便哪一届研讨班，恰恰就是其出版今天正在引发问题的那一届研讨班[注57]！

> [注57] “对许多人来说，［agalma 这个词的］谜团如此彻底，以至于大家都在问：‘什么？他说了什么？你们知道吗？’总之，对于那些表现出这种不安的人，我家中的某个人至少能作出这样的回答——这证明，至少在我家，中等教育还是有点用处的——它的意思是装饰、饰物。”J. 拉康，《移情：在其主体差异、其所谓情境及其技术性偏移中》，1961年2月1日的一课。

在等待外孙能够把 家产（kléros） 重新投入社会之际，保管它的人有义务不触动它，而将它完好无损地保存在 thalamos 中。这一点也印证了我们的分析。要解释十年来拉康的东西为何出版得如此之少，我确实看不到别的办法，只能承认：在这个时期，这件事受到一项义务的约束，即不得解除 家产（kléros） 的冻结。这种“不去做的意愿”有它的存在理由，甚至有其高贵之处。它是拉康想经由承产女途径传承自己 家产（kléros） 的意愿的主要构成之一。

只有这样的“想要不去做”，才能解释为何拉康已经写成的文本仍然持续不出版：这些文本不需要再作文本整理，数量很多，目前散布各

处，甚至难以找到；然而，出版它们原本只需要很少的工作。它也解释了这样的事实：多年来在杂志《L’âne》或《Ornicar?》中发表的少量文本，偏偏取自拉康最容易获得的那些文本。

最后，它解释了已出版文本的整理何以具有症状性质——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妥协形成的意义上。按照承产女式传承的体制，作为家族 家产（kléros） 而被持有的研讨班——即被视为研讨班的东西，速记员所作的转录——暂时不可触动。而在今天因《移情》研讨班的出版而再度被提起的这桩事中，最令人惊讶的情况之一，就是不得不与一眼便看出此事的达妮埃尔·阿尔努一道确认：雅克-阿兰·米勒在极为大量的地方，纯粹而简单地照搬了速记员的转录，连其中的错误也照搬，却不能自我授权去纠正它们，甚至不能辨认出它们——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有官方转录者仍然拒绝采用的文本校勘方法。然而，他事先已被提醒过；他自己就曾写道，其中“误解丛生”[注58]！这种不可触动性带来的严重损害，标志着：对于任何接受这一传承家族化的人，这个文本都是极其不可支配的。即使这是拉康所想要的，也不能免除我们作出自己的决定：我们是否想要他所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出版就会成为症状：如果转录者作为承产女制中的女婿，受到不得出版的约束，但同时又以为，出于另一层面的要求，他必须出版——这一层面涉及通过学派传承分析，也涉及拉康已在社会中获得的承认；这种承认具有相应的另一面，即社会在他死后仍向他提出的要求——那么，回应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的唯一办法，就只能首先尽可能少地出版，然后把那些尽管如此仍会出版的东西，以一种“无法使用”的方式出版。E. 鲁迪内斯科的这个词，向我们标示了

承产女式传承。这样，人们便尽可能地把珍贵的 agalmata 留在父亲的家宅中。

> [注58] 雅克-阿兰 · 米勒，题为《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的研讨班第21条注释中引及的说明。

结论

是否需要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拉康最终会选择承产女式传承？由于偏执狂式认识的要求，人们当然可以把一种计算归给他；那是他也乐于归给弗洛伊德的计算。例如，恰恰在建立承产女制之际，他告诉我们，弗洛伊德把一个寄生的组织“嫁接”到自己的言说上，而这个组织又会成为“他的所说的嫁接 / 书记处”[注59]；或者，他说弗洛伊德“明白地”想把那个受其 家产（kléros） 遗赠的组织设置为 SAMCDA——转写为：反分析话语互助协会（Société d’Assistance Mutuelle Contre le Discours Analytique）[注60]。这些“计算”确实显得离奇曲折，却并非没有后果。但说实话，我不确定，追问拉康选择承产女式传承时可能具有的动机，是否真的是一个应当提出的问题；甚至不确定，它是否恰恰属于那种只会使我们徒劳激动的问题。更彻底地说，从学派的立场出发，并不能排除：对这一选择的动机，应当回应以“我对此什么也不想知道”；这当然会截断困窘，而其恰当与否，只能从后续结果来衡量。我对此什么也不想知道，只需我说“不”——只要我异化于这一说不，达到接受其后果的程度[注61]。[注]

[注59] 雅克 · 拉康，《L’étourdit》，《Scilicet》第4期，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第13页。

[注60] 雅克 · 拉康，《电视》，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年，第33页。

[注61] 这就截断了从本文出发、可能滑向对雅克 · 拉康进行精神分析的任何倾向。我们认为，自己在这里已通过行动拒绝了这种分析：只提及了足以支持所要提出论点的最低限度的家族材料。对于那些在听过研讨会报告后认为——有时还非常愤慨地认为——这已经说得太多的人，我们指出：这些材料确实是拉康自己带入研讨班和某些发言、向我们说出的东西，因此，我们有责任把它们放在与其教学的关系中。如果我们的反对者对这些材料有更好的读法，拜托，请提供给我

> 们。反过来，对于那些认为我们说得还不够的人，我们指出：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已经彻底拒绝了任何自称回到原初源头、重新找回回忆及其自以为所记得之物的历史研究；这种研究不切题，尤其不符合弗洛伊德与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重复。

> [注] greffe 既可指“嫁接”，也可指司法机关的“书记处”；作者先写 greffé（嫁接），继而写 greffe de ses dits。译文保留这一词形呼应及名词的两义，没有将它化约为单一组织职能。

在《不受骗的人在游荡》研讨班1974年4月9日的一课中，拉康这样说：

> 因为，虽然他［精神分析家］只从自身授权，但也正由此，他不能不同时从其他人授权。我把自己限制在这一最低限度，恰恰因为我在等待某种东西被发明出来，等待某种关于团体的东西被发明出来，而不再滑回那条旧车辙。那条车辙使人由于旧习惯而被任命为……，获得一个头衔；说到底，我们对于这些旧习惯缺乏防备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正是它们构成了所谓大学话语的基础。

如果拉康的断言——“……确实，人不能被任命到精神分析上去……”[注62]——构成了其教学的一块真正的基石，那么，他的研讨班出版所经历的最新变故，就迫使我们承认这一表述的效力必须扩大：人不能被任命去转录他的研讨班。事实表明，被任命去转录，与以一种能使读者信任所提供版本的方式进行转录，两者之间存在不相容。

> [注62] 这句话就在上面几行；1974年4月9日的两段引文，均摘自一份非官方转录，但其质量实属罕见。

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但它格外能说明问题。雅克-阿兰 · 米勒最初把编号为第十六期的研讨班标题写成“D’un autre à l’Autre”（从一个小他

者到大他者）；他声称，这是特意遵循拉康给他的指示。如今，他把这个标题写成“d’un Autre à l’autre”（从一个大他者到小他者）。我曾在1984年6月《Littoral》的一篇文章中，用两页篇幅讨论这一标题的整理[注63]，这件事已不再有任何疑问。然而，甚至到1986年9月，《精神分析的伦理》研讨班的护封上，仍然印着那个错误标题；直到最近，即1991年3月，错误才得到纠正。因为，从严格的文本整理立场看，它确实是一个错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第三条路可以绕开的二选一：或者认可拉康当时给出的指示，那么就会与《从一个大他者到小他者》研讨班中所有支持如此书写标题的东西相冲突；或者参照这届研讨班留下的痕迹，从而正确书写标题，但这样一来，就必须追问拉康那一天为什么给出了错误的指示——从而追问，人们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向他提出了询问。

> [注63] 让·阿卢什，《拉康遭到审查》，《Littoral》第13期，1984年6月，图卢兹，埃雷斯出版社，第109—120页。

一个人自我授权去转录拉康的某一届研讨班，却并未被他任命担任这一职能，这种位置也有其逻辑。如果这种位置确实只能从向拉康建立的传承家族化说不出发而被维持，那么转录者迟早必定会面对这个问题：在拉康那里，承产女式传承的这一选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学说，尤其是他在1972年以后所开辟的内容。例如，在《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研讨班1976年11月16日的一课中，拉康宣称：

> 我以这三个名字［象征、想象、实在］为一场开幕讲座命名；总之，它们通过我，成了弗雷格所谓的“专名”。确立一个专名，是一件会让你自己的专名稍稍上升一点的事情。在这一切中，唯一的专

名，是我的名字。把拉康延展到象征、想象与实在，使这三个术语得以持存。我对此并不特别自豪。

问题在于，凡是拒绝了承产女式传承这一选择的人，在认定上述话语属于这一选择之后，是否也必须在同一运动中拒绝这样的话语？抑或在精神分析中，开路者的专名具有一种根本上非家族性的功能？但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功能？

同样，当拉康最终说，除了相邻两代之间，没有性关系时[注64]，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一点是否与承产女式传承的选择严格地相互依存？

> [注64] “我以现在时说出，没有性关系。这是精神分析的基础；至少，我允许自己这样说。没有性关系……相邻两代之间除外，即一边是父母，另一边是孩子。乱伦禁令所防范的——我说的是性关系——正是这一点。”J. 拉康，《结论的时刻》（Le moment de conclure），1978年4月11日的一课。

更一般地说，辨认出并拒绝这一选择，就使我们承担起了责任。如今，时间已经打开。问题出现了，我们不能再不提出它们；然而，正如拉康开路时一样，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直面真理，或者使我们的知识沦为笑柄”[注65]。[注]

> [注65] 雅克 · 拉康，《1967年10月9日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议》，前引文，第24页。

> [注] 底本此处连写“Voici désormais ouvert le temps Des questions se présentent”，temps 与 Des 之间未印标点。译文按句法补句号；法文保留原状，未补写底本中不存在的其他文字。